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ISSN 1008-245X,CN 61-1329/C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数字化孤立的表征、归因与破解路径
作者： 孟书敏，刘儒
收稿日期： 2024-06-24
网络首发日期： 2024-12-09
引用格式： 孟书敏，刘儒.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数字化孤立的表征、归因与破解路径[J/OL].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29.C.20241209.1141.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数字化孤立的表征、归因与破解路径

孟书敏，刘 儒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面探讨数字化孤立的表象与本质，是对数字化消极结果的理性审视。从作为经验事实的数字化进程出发，观察劳动者的数字技术适应、社交适应以及文化适应的整体状态，系统呈现数字化孤立的现实表征。深入解析数字化劳动形式和就业形态，从数字“技术—资本”范式下的经济不平等、数字“交往—分化”结构中的社会支持系统缺失、数字认同差异中的数字化抵抗三个方面探究数字化孤立的深层经济社会根源。在此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把数字劳动形态看作“技术一般”，提出通过数字技术治理赋能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劳动者为中心的数字经济生产关系，重塑数字理性与人文价值相统一的数字认知等数字化孤立的消解路径。

[关键词] 数字化孤立；政治经济学批判；数字劳动；数字经济生产关系；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3

[文献标识码] A

“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1]416}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数字经济方兴未艾的当下，数字技术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深度结合，推动传统劳动形态向数字劳动转化，使得人的整体生存状态呈现出“数字化”趋势^{[2]228}。一些人对数字化过度依赖而脱嵌于现实，一些人被数字化浪潮“排挤出去”^{[3]356}而处于数字化之外。技术进步应当增进社会总体福祉，而不是造成社会分裂，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数字经济的普惠性^[4]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5]，体现出党中央对数字化问题的深刻洞察和对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视。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的、历史的方法审视数字化进程及其影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方面出发探讨数字化孤立的表象与本质，在系统描述与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解析其深层原因，并尝试建构更加平等包容的数字生态。

一、问题缘起

数字化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方向，对全球经济格局和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化突破了计算机术语范畴，是引起产业、资源、治理、社会生活等物理事物、信息、过

【收稿日期】 2024-06-24。 **【修回日期】** 2024-09-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9YJC71005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4A004）。

【作者简介】 孟书敏（1983—），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儒（1959—），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向数字形式转化的多维社会现象,其所带来的复杂图景已经进入多学科研究视野,经济学、社会学等从不同角度解释和分析了数字化及其影响。

经济学对数字化的研究基于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形态等的影响。韩文龙等^[6-7]关注数字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强调数字化加速了新技术的涌现和传播,推动了新经济形态的崛起。王军等^[8]关注数字化对劳动市场的影响,认为数字化加速了劳动力市场变革,推动了新型就业形态的兴起。何自力等^[9]分析了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束缚着人的发展、强化了资本势力。国外学者如 Brynjolfsson^[10]也关注到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生产力和效率,推动了经济发展。Puaschunder^[11]提出了数字行为经济学的概念,将数字技术对经济主体的影响机制、数字技术如何优化个体决策、数字不平等、数字隐私与伦理等内容纳入研究框架。Richard^{[12]3-5}提出的注意力经济观点探讨了在信息过载环境中人们如何分配自己的注意力资源,以及这种分配方式如何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

社会学聚焦数字化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在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方面,数字化的新型社交互动模式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产生了重要影响,塑造了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和社会身份^[13];在信息获取和知识传播方面,数字技术为知识的传播和分享提供了新的途径,使得信息获取变得更加便捷和广泛,推动了知识社会的发展^[14]。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主义提供了技术和社会互动关系的不同视角,前者认为技术的发展和特性主导了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的变化,后者强调技术的影响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技术以及赋予技术何种意义。社会资本理论强调“资源”在社交网络中的重要性,关注数字化对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的影响。

此外,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也从不同角度解释和分析数字化进程及其影响。总体来看,各个学科在数字经济的积极意义上取得了诸多共识,同时揭示了数字化对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及社会心理带来的挑战。数字鸿沟理论较系统地揭示了信息技术的采纳和使用可能会带来的阶层分化,它以大众传播理论中的“知沟理论”为基础,以“数字鸿沟”定义信息化导致的新的知识沟。该理论重点关注人们访问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平等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信息获取、社会参与和经济机会方面的差异^[15]。韩雷等^[16]通过测度 2018 年中国各行业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收入,且能缩小低技能群体和高技能群体内部中低收入差距。白雪洁等^[17]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各区域人均收入水平、缩小各区域收入差距,且影响效果呈现为低收入组优于中收入组优于高收入组。张笑等^[18]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百度指数数据,对“数字鸿沟”与公民社会公平感知程度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究,发现新兴技术变革加剧了公民的社会不公平感,但公民自身的社会阶层认知能够缓冲由新技术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外学者托夫勒等^[19-20]也关注到数字鸿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数字鸿沟可能阻碍一些地区或群体参与数字经济,加剧了地区经济的分化和不平衡发展。还有研究提出数字化可能加剧财富集中的不平等现象、贫困人群和边缘化群体更加难以融入数字化社会等观点。

上述研究对数字化引发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为本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化时代与工业化时代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新技术主导下生产领域发生根本

性变化、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急剧变革、交往方式与社会关系呈现新形态、新的社会不平等出现，等等。在工业化时代，“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21][24]}，孤立个人的生产事实上已不存在，因而，马克思通过把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置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中描述人的劳动在金钱、资本中的异化^[22]，揭示了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的经济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23][484]}，为了劳动过程不致中断，必然通过不断更换工人以保持生产的继续。马克思透过劳动者分工协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表象，揭示了人的单向度、孤立化特征，进而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展开批判。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重塑着劳动力要素、劳动组织方式，进而重塑人的存在状态，使得一些个体或群体因技术、经济、文化障碍无法融入数字社会而被遗弃，最终导致其在社会生产活动、社会交往和心理层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经济迟滞、交往孤立或认知偏差等边缘化或隔离状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即使个体或群体拥有足够的数字技术资源和能力，他们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如过度依赖数字媒介、算法推荐系统的“信息茧房”效应、缺乏面对面的社交互动等，而感到与现实社会或其他社会成员的隔离。这种状态是数字化的消极结果，与马克思描述的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的陌生感、失去归属感和疏离感如出一辙，因此，本文将这一现象定义为数字化孤立。

二、数字化孤立问题的理论视角

数字化孤立与原子化社会所造成的孤立存在显著区别。原子化社会中的孤立源于现代社会结构变迁、传统社会纽带瓦解以及个人主义的兴起，使个体逐渐从群体中分离，成为独立的“原子”而失去与他人的紧密联系，它强调个体与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疏远。数字化孤立侧重描述数字化进程对个体—社会连接方式、联系状态的影响。为了对数字化问题展开深层“解蔽”，本文将数字化理解为像工业化一样的社会历史进程，强调信息领域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这种理解有助于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全面解构数字化孤立问题。就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商品时坚持超出商品本身的分析范围一样，解读数字化孤立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时，也应超出对数字实践本身分析的范围，把数字化作为“技术一般”赋予其历史意义。即是说，不能把数字化孤立仅仅作为经验事实来看待，而是应当把它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待——把它当作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赋予数字化以历史性的内容。因此，本研究的理论逻辑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从生产力的视角看，作为历史发展趋势，数字劳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数字劳动以数字技术发展和资本扩张为前提和基础、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载体向生产过程渗透。就像蒸汽机在工业革命时期推动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一样，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当代的劳动形态和社会结构，这种转变不仅表现为物理劳动的电子化，更涉及知识劳动的自动化和算法化，以及劳动过程的深度监控和管理。数字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加速进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时代的“标配”，它与劳动过程深度融合，表现为劳动力的数字化、生产资料的数字化、分配的数字化以及消费的数字化。其中，劳动力数字化涉及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要求、数字技能的可获得性、远程工作岗位的比例和效率等；生产资料数字化涉及生产资料数字化的份额与速度、数字生产资料的获取和使用效率；分配数字化涉及数字资源获取的公

平性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消费数字化包括数字化购物普及程度、产品信息获取渠道、消费模式偏好、消费行为隐私保护、消费纠纷处理效率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生产力数字化的程度与效率。

其次，从生产关系的视角看，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直观表征和现代产业前沿的技术特征，数字化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和形式，推动生产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4]591}。在深刻洞察了蒸汽机的使用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之后，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社会他人乃至自身本质发生割裂的“异化”现象。不过，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异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劳动者无法控制、使用或分配自己生产的数据或基于数据的服务：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之间表现为一种新型的疏远。此时，劳动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同时还是自己数据的生产者，即数据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数据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也是生产结果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数据结果却不为它的生产者所有。随着资本对信息和数据控制的加剧，数字化实践及其成果愈发脱离劳动者的掌控，反过来又成为支配他们的力量。

最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视角来看，数字化孤立具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有其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会推动人类社会趋向更高级形态。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一段时期内造成的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经济和社会、物质和心理层面的割裂，最终会在历史进程中得以消解。这是因为，“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25]536}。数字技术发展将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会促进更加公平的信息分配和更加普遍的数字接入，进而重新塑造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但是，这种转变并非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要求人的主体性确证并积极实践的历史进程。因而，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的历史进程。

基于此，本文坚持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逻辑，关注数字生产方式如何塑造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重新审视技术和经济力量在社会中的作用，从人的数字化劳动和数字化生活两个维度考察数字化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及其影响。首先，从作为经验事实的数字化进程出发，观察劳动者的数字技术适应、数字社交适应以及数字文化适应的整体状态；其次，深入解析数字化劳动形式和就业形态，重点聚焦数字劳动领域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生存境遇等，以此探究数字化孤立的深层经济社会根源；最后，在现实性解构的过程中论证数字化孤立的历史暂时性。本文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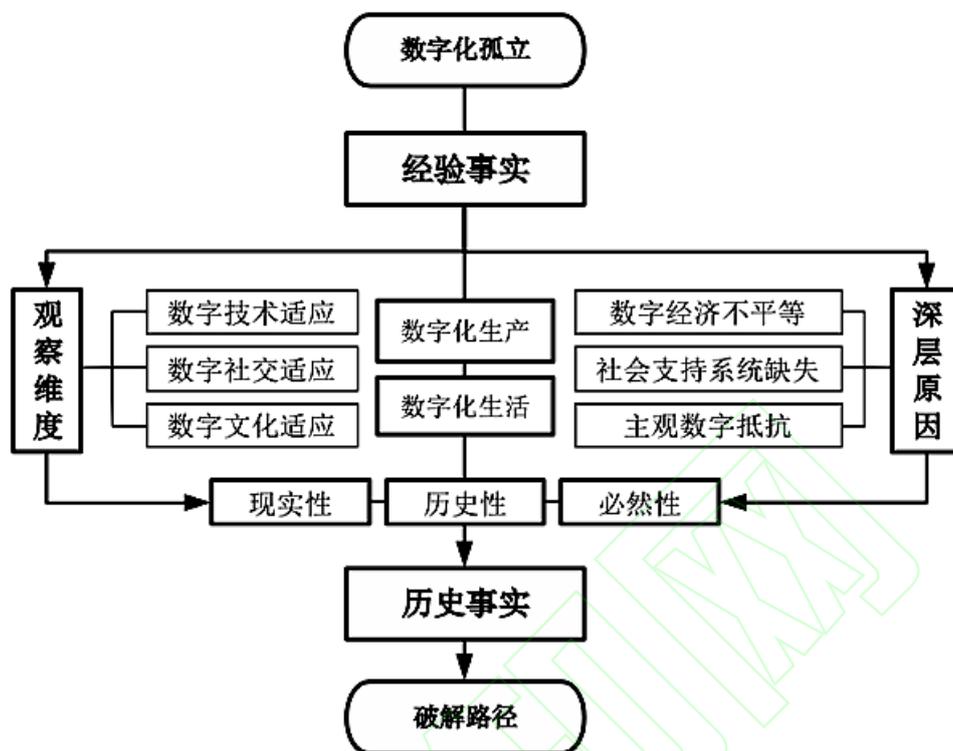


图1 本文研究思路

三、数字适应与数字化孤立的现实表征

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6]520} 数字技术是现代生产力进步的标志之一，它引起人的更大程度的解放与新形式的束缚并存——无论是在生产向度还是生活向度，都对劳动者的数字化适应提出新要求。此时，数字不再作为连接和赋能的工具，而是成为人与自己的劳动、与他人、人与自身相疏离的源泉。

（一）数字技术适应与劳动过程脱离

数字技术适应主要涉及个体或群体的技术能力、经济条件限制或者对新兴技术的访问性差异，当劳动者参与数字技术的程度较低或者对数字技术的压力感知较强烈时，便“游离”于数字化之外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劳动过程脱离。

劳动过程脱离首先表现为技术对人的排斥。这是技术设计或应用过程中的人机交互对个体的直接影响。虽然数字技术的应用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这些机会往往要求更高的技能和教育水平，排斥传统行业中的低技能劳动力，导致技能不匹配和劳动市场的分化，表现为“劳动力的剩余”。这与马克思的描述一般无二：随着机器的引入和工场制度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积累表现为同一个过程，因为“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23]708}。随着数字技术的使用，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急剧变化，一些人面临技术壁垒而被排斥在就业之外。此外，新的技术设计往往侧重于实现特定的功能或效率目标，忽视用户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这种技术设计上的排他性可能导致特定群体（如非技术人员、老年人、

残疾人等)在使用过程中面临技术障碍而直接被排斥。

劳动过程脱离还表现在劳动者对劳动控制的弱化上。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使得许多劳动过程被机器和算法替代,从简单的物理劳动到复杂的决策制定,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直接联系被切断,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被边缘化,逐渐丧失劳动过程的意义。劳动成果越来越多地归功于技术要素而非人的直接劳动,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控制。

(二) 数字社交适应与社会关系隔离

数字社交适应反映个体在数字环境中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的状态,比如数字社交的多样性、在线社交活跃度与社交质量、数字社交的满意度、在线与离线社交之间的平衡等。在数字化时代,数字交往的“身体缺场”特征为社会交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根本上远离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质要在其社会关系中得以体现和实现,“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501}。但是,不能就此把这个论断理解为“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这些社会关系需要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建立和发展起来。人的社会化过程不仅体现为学习语言、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社会元素,而且通过这一过程将自身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进而实现社会角色的发展。在数字场景中,人在技术塑造的虚拟现实空间中进行交往,人的主体性表现为符号化、碎片化的自我,人的交往异化为符号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实际联系和深度交流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表面的、失真的、碎片式的联系,这与人的社会性交往的需要相去甚远,从而“导致自我认知关系异化和人与人交往映射关系异化,最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逐渐远离了社会属性”^[27]。

一方面,数字交往如果停留在表层的互动和信息交换,就会削弱个体在社会角色、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方面的深度连接,从而缺乏对真实的社会互动和深层次的文化体验、探索和内化,淡化社会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人的交往行为离不开现实人的目的和意识,包含着交往主体的现实需求和情感依赖,但作为人类技术造物下的交往新形态,数字交往使得个体在物理空间中的社会活动减少,在虚拟空间中的活动增多,使其在广泛的社交网络中丧失真实的归属和深刻的人际联系。再者,处于数字交往中的人通常只能被动地接受算法提供的二次过滤信息,提供人们愿意相信、喜闻乐见的信息,从而诱惑数字交往行为进一步占据人们的全部交往生活。如此一来,传统社会化过程中所固有的深度、多维性和社会黏性也可能被轻易抛却。

(三) 数字文化适应与自我本质疏离

数字文化适应是个体或群体对数字文化和网络社会的规范、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的适应,包括数字文化价值认同、数字行为模式认同以及与个人文化背景和偏好相关的数字内容覆盖程度、数字文化隔阂的感知等。计算机文化学者 Turkle 关注了数字化对人存在状态的影响,其著作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关注了人的网络身份的塑造问题, *The Second Self* 探讨了计算机对人的思考方式的影响。她认为虽然数字技术提供了便利的交流工具,但也可能导致人们更加孤立和隔绝。

数字化时代,算法驱动的交往模式和信息过滤机制,将人限制在信息茧房之中,导致自我表达与认知的偏差。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26]501},而是自

由的、有创造性的活动，强调人通过自由和有目的的劳动改变外部世界，同时也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发展。但是，随着数字劳动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工，劳动过程被分解为更加单一、易于重复的任务。一方面，每个人只能参与生产的微小的局部环节，使得劳动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愈发成为单调、缺乏创造性的活动，个体的社会互动和创造性表达难以充分发展。这种趋势不仅限制了个体在数字环境中的自由和有目的的活动，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个体本质能力的充分发挥，从而使其与自己的主体性相异化，表现为认知固化、自我审查与表达的障碍、流量和数据标识的价值观迷失等，丧失人通过劳动和创造性活动实现自我价值的本质。

就“单个人”而言，数字化使其在现实生活和数字生活之间出现割裂。这种割裂不仅涉及个体如何在不同场景中呈现自己，也关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不同场景中的位置和角色。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是基于长期的社会互动和经验积累构建的，而数字身份往往受情绪、场景、趋势和网络群体的影响，更加即时、易变和失真。严格意义上讲，数字身份并不能代替人成为交往主体，因为它无法复制人的交往中最为核心的元素——情感交流、深度理解和共情能力，这些元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个人”本质的外化及其社会关系的基石。当个体在维持线上和线下身份的连贯性遇到困难时，也会产生角色模糊和身份的不确定感，给自我认同带来深层次疏离。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数字化孤立的深层原因解析

表面上看，数字化孤立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因此，技术的“应用”问题也自然地进入学术研究的批判视野。但是，就像“‘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21]343}，从“机械发明”到“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中间存在许多必不可少的环节值得研究。可见，对数字化孤立成因的探究，始于技术但又不能停留于技术，而是要深入解析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劳动过程，进而改变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并“归根到底”引起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方式、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变革。

（一）数字“技术—资本”范式下的经济不平等

数字经济以“技术—资本”范式为显著特征，在“高技术”与“强资本”的深度融合中，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表现为对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控制。这种控制权下的技术与信息资源不均衡，数字化政策差异，数字化基础的城乡、区域差异等，成为新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论述强调资本的集中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平等，这在数字化时代表现为高质量的数字资源倾向于掌握资本和技术的少数群体，并逐渐形成信息流通、技术利用的壁垒和数据资源的垄断，从而不同社会群体在获取数字资源上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在全球化和网络化加深的背景下，这种不平等变得尤为显著：经济富裕的地区或个体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数字资源，进一步增强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形成正向反馈循环；而那些由于经济条件、教育背景或地理位置等因素被边缘化的群体如果未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帮扶或激励措施等包容性政策支持，将在数字资源的获取上面临更大挑战。

劳动者的“分散化”和“去技能化”是数字经济不平等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劳动者“分散化”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空间位置不受限制、工作时间弹性化、组织归属弱化等，尽管这在

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劳动与生活的平衡，但同时也会带来其他社会性问题。例如，分散的工作环境意味着人的社会性活动减少；工作时间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使劳动者难以彻底脱离工作状态。在一些情况下，自动化和标准化对专业技能的替代、低门槛的接入和低技能的泛化较为普遍，使劳动者面临“去技能化”或者成为数字技术的附庸。例如，某些行业如制造业和数据处理领域的许多劳动可以通过智能设备自动完成，众包平台（如 Amazon Mechanical Turk）允许“人力云”（crowd workers）完成图像标注、简短调查或内容审核等简单的任务。这种技能的置换直接占据了一些劳动者的工作机会。

在更加广泛的经济层面，随着数字技术对资本的实际隶属不断被强化^[28]，上述不公平现象会加剧已有的不平等：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无法充分投资于教育和技术，他们更加难以获得好的工作机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并加剧社会分层和经济差距。此外，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持续的学习和适应是必要的，对于那些不具备终身学习观念或没有获得持续教育机会的人来说，跟上技术的步伐尤为困难。

（二）数字“交往—分化”结构中的社会支持系统缺失

随着社会交往从传统的、物理上的紧密联系形式转变为分散的和多样化的连接方式，这个过程中的交往“分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技术驱动的社会互动方式彻底改变了人们建立和维持关系的方式。技术驱动的交往方式如社交媒体、即时通信软件和视频会议平台等，使人的交往呈现出显著的即时性、短暂性与浅层化特征。传统的面对面交流被即时消息、视频聊天、论坛讨论等形式取代或补充，使得人们可以更灵活地选择交往的时间、表现状态和交流频率，交流的低成本与高效率并存，人们倾向于维护更广泛但更浅层的社交网络，更侧重于信息的交换而非情感的共享。例如，微信和 WhatsApp 等即时通信软件使交流更加频繁，但这种交流往往是碎片化的，甚至表现为“信息过载”。人们被大量琐碎的信息淹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丧失传统意义上的深度和承诺而脱嵌于固有的现实社会关系，即从固定的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变得更为流动和不稳定。

其次，数字化环境使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复杂和模糊，社会归属感更加脆弱和易变。数字平台使个体有更大的自由度来探索自我，也使个体根据不同的社交环境展示不同的自我成为可能——选择性地展示自己的某些方面，而隐藏其他方面，从而寻求广泛的社会认同。例如，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上的用户往往展示自己生活中的美好瞬间，而隐藏了真实生活中的烦恼和困境。“精修”后的形象容易引发他人的羡慕和追随，但也使得用户自己陷入一种“表演性”的生活状态，这种身份的可塑性和多样性又会导致个体在现实生活与数字生活之间的身份冲突、真实自我与网络自我之间的分裂。个体在不同平台上展示不同的面貌，会进一步加剧身份认同的模糊和不稳定。就社会归属感而言，传统社会中的个体，其社会归属感通常与物理空间紧密相关，稳固且持久。而在数字社会中，人们可以轻易地加入基于兴趣或观点的虚拟社群，这种基于选择的归属感可以随意重建和破坏，往往比传统的地理或血缘关系更为脆弱和易变。因此，数字交往中的人可能随时面临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

再者，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互动常常伴随着对点赞、评论和分享的追求，微信、抖音、Facebook 上的用户可能会因为一条动态的点赞数不足而感到失落，这种对社交验证的需求可能影响个体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反馈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

而不是依赖实际的人际支持。这种依赖性加剧了社会关系的脱嵌，使得人们在数字环境中更难建立和维持深厚而持久的关系。

（三）数字认知差异中的数字化抵抗

主观的数字化抵抗也是造成数字化孤立的重要原因。个体对数字技术的认同度、在数字化中的获益程度、在数字交往中的表达能力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质量变化等的影响，使得不同个体参与数字化的意愿有所不同。此时，数字化孤立不仅是客观技术因素的结果，也是深层次主观抵抗的结果，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数字经济认知中的数字化抵抗。面对数字经济新事物，一些人出于自身的恐惧或不信任以及对数字平台的认知偏差等，或者出于对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的担忧而拒绝深度参与其中，尤其是那些风险敏感群体，更易于选择规避风险。从更深的层面看，这是关于技术权力和控制的根本问题^[29]：技术的不均衡分布加剧了经济不平等，那些能够访问、掌握并利用新技术的个体和群体，比起那些被技术边缘化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塑造经济活动。现代经济学者 Zuboff 关于“监控资本主义”的论述，指出了数字技术如何转化为一种控制工具。在数字经济中，企业通过收集和分析大数据来优化其服务和产品，而普通个体因数字识读能力或数据处理方式的不足，使其成为数据的源泉而不自知，无法有效控制个人信息的使用和分配。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Cohen 在对数字市场的批评中研究了数字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认为当企业拥有比消费者更多的信息资源时，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决策能力将被削弱。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数字技术背后的深层次控制，并把其视为外来的、不合适的或威胁性的事物时，就会选择对数字化有所保留。

其二，数字交往认知中的数字化抵抗。从某种意义上讲，基于数字技术的权力控制远超以往社会^[30]，对于一些个体而言，数字化抵抗不仅是技术权力的隔阂，更是一种社交深度的丧失，他们认为人无法在数字环境中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Turkle 在其著作 *Alone Together* 中深入分析了技术如何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她的研究强调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自我呈现和监控行为，这些行为加深了个体在真实与虚拟自我之间的分裂感。心理学家和技术批评者 Carr 以及社会心理学家 Twenge 分别表达了数字交往方式对认知结构和心理健康影响的担忧。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的理论指向了同一个关键问题，即技术的应用问题。当数字技术按照特定的经济逻辑被设计和利用，必然与以往一切世代的技术创新一样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跃升。但数字技术又呈现出与以往技术创新的显著区别——它的应用突破了生产范畴，以前所未有之势进入人们的生活，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显然，基于经济逻辑的技术被应用于社会生活，非但不能促进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交流和社会连接，反而成为加深社会分层和隔离的工具。

其三，数字文化认知中的数字化抵抗。在数字文化洪流中，个体还可能因不理解或不接受新兴的数字文化形式（如网络语言、虚拟现实艺术等），或者无法拓展有效的网络社会资源而自我隔离。这种文化隔阂往往是“数字移民”“数字难民”群体的数字认同差异的外化。一些学者关注到了数字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文化理论家 Jenkins 探讨了媒体融合对文化生产的影响，指出数字文化通过使用户参与内容的创造和分享，促进了文化的民主化，但也带来了数字化屏蔽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提出文化资本概念，认为在数字文化中，信息和内容的访问及其解读能力变成了新的文化资本形式，那些拥有足够资源和能力来获取

和利用这种资本的人，可以增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而缺乏这些资源的人则可能遭遇文化排斥。批评理论家如 Andrejevic 和 Dean 讨论了数字平台如何通过算法和数据挖掘加深社会控制和监视，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个体的文化自主性，使得文化生产更加服从于商业逻辑，而不是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自由表达。这种背景下，数字化抵抗不仅反映了个体对新兴数字文化形式的理解或不接受，也凸显了数字资源和数字权力分配的不均衡。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数字化孤立的消解路径

对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反思，归根到底是对数字技术进行反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机器设备、科学技术等都不必然是“恶”的存在，它们之所以成为资本增殖的“帮凶”，根源于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需要。数字技术“恶”的方面在人的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两个深层引发的孤立化问题，与人的实践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一样，是发展着的，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正因如此，需要多方面着手积极推动这一问题的消解。

（一）通过数字技术治理赋能高质量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31][52]}，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要在赋能劳动者、优化劳动资料和重塑劳动对象的过程中赋予生产力新的内涵，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为支撑，科学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治理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过程。其一，要提升数字技术治理效能，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生态。发展、安全、治理、普惠等理念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容，要通过数字技术连通性与互惠性建设，促进技术访问的公平性与可及性，减少数字劳动市场的失范行为，建设以人为本的数字环境。要推进数字资源信息数据库、数据科技人员信息库建设，通过“数据+算力+算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数据共享与整合、优化决策和高效管理等方式推进数字技术治理。其二，始终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导向，不断完善以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的发展格局。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因此，技术的发展应兼顾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在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借资本与技术“共谋”之势，因势利导，推动数字核心技术创新与城乡、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发展、互惠共赢发展，促进生产力质的提升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三，要通过完善数字技术规范 and 立法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建立更具公平性、前瞻性和包容性的数字政策法规，进一步加强与技术向善相适应的数字立法。推动数字技术充分赋能社会治理与法制系统完善，在数字技术监管与审核、数据安全漏洞监测、劳动者“离线休息权”“数据隐私权”保障、数字社区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充分着力，借助数字技术动态追踪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生活需求和权益保障，增强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普惠性。

（二）构建以劳动者为中心的 digital 生产关系

数字技术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数字生产关系以资本与科技的“共谋”为特征，表现为“生产流水线”向私人活动空间延伸，使得人的生存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同时被打破。因此，变革数字生产关系意味着要重新审视数字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从所有权、参与权、分配权等方面实现生产关系的超越，就必须构建以劳动者为中心的 digital 生产关系。

多元参与与社会包容是数字生产关系的核心。鼓励各类社会群体，尤其是游离于数字化边缘的劳动者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消除性别、年龄和种族歧视，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与互助。其一，要从所有权方面保障劳动者主体性的复归。通过数据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和去中心化的数据管理，建立更加公平的数据共享机制，赋予劳动者更多的数据自主权。建立公平、透明和安全的数据共享机制，鼓励企业、政府和个人之间的数据交换，打破数据垄断，促进数据的公平利用，从而促进更广泛的数据共享和协作。其二，从参与权方面确保劳动者的主体性发挥。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提升劳动力的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提供灵活的工作模式，支持个性化发展、人性化管理，有效提升劳动者的参与意愿，增强劳动者的主体性感受。支持技术教育和培训项目，确保劳动者群体都能够掌握必要的技能，能够充分参与数字经济。其三，完善数字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系统，设计包容性强的分配政策，确保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能够惠及全社会。例如，设置数据使用费或税目，将部分收益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在保证覆盖面的基础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仅要发展数字生产力，还要共享数字生产力，以平等包容的数字劳动关系推动形成自由、自觉的劳动形态。

（三）重塑数字理性与人文价值相统一的数字认知

作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与数字网络扩散几乎不同程度地把每个人卷入其中。在与信息世界互动融合的过程中，人应该如何应对自身生存境况，主动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再社会化”过程，促进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积极迎接数字化带来的人的解放的可能性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一，时刻关注人的本质需求是确保数字技术发展符合人类利益的关键。数字技术的便捷与普及，并不意味着数字化生存是唯一的生存方式或人类生存的全部。人类作为社会生物，需要多样化的生活体验和交往方式。因此，在技术创造和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要始终秉承人本价值，时刻关注人的本质需求。这意味着在技术设计之初就要考虑人的情感、心理以及社会交往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迎合技术上的突破和市场的扩张。其二，要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避免为数字符号所操控和代替。通过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重新塑造人对数字化的认知，关注人的技术批判意识的培养，让人们意识到技术的使用和发展归根结底是满足人的主体性需要的工具之一，数字技术应该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工具和支持，而不是成为人类的主宰和控制者。其三，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更加坚持和恪守人文精神，高扬人的价值理性，把人文精神注入数字符号，正确处理虚拟与现实的关系，避免数字化生活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和个性消解，在有序性和合理性的数字化生存中强化人的尊严和多样性，通过加强人的思想觉醒和自我认知，实现数字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和谐统一。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习近平向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N].人民日报, 2023-11-9 (1) .
- [5]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 2020-11-22 (1) .
- [6] 韩文龙,唐湘.平台经济的新就业形态与经济关系解构: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J].学术月刊, 2024, 56(6): 63-74.
HAN W L, TANG X. The new employment form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its economic relationship: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J]. Academic Monthly, 2024,56(6):63-74.
- [7] 秦淑悦, 黄曠琳.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结构优化: 内在机制与经验依据[J].经济学家, 2024, 36 (4) : 98-107.
QIN S Y, HUANG Z L. Digital inputs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basis[J]. Economist, 2024,36(4):98-107.
- [8] 王军, 常红.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21, 65 (8) : 146-160.
WANG J, CHANG H.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labor market[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1,62(8):146-160.
- [9] 何自力, 彭李政.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J].当代经济研究, 2024, 35 (3) : 5-17.
HE Z L, PENG L Z.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new changes in the labor-capital relationship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2024,35(3):5-17.
- [10] BRYNJOLFSSON E, HUI X, LIU M. Does machine translation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a large digital platform[J]. Management Science, 2019,66(12):5449-5460.
- [11] PUASCHUNDER J.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leadership[M].Cham:Springer, 2021.
- [12] RICHARD A L. The economics of attention[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 [13] 郭小弦, 周润琪.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模式: 线上与线下的对比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23, 39 (12) : 84-92.
GUO X X, ZHOU R Q.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in the digital ag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23,39(12):84-92.
- [14] 曾俊淇, 李江静.数字时代传播格局的系统性重构及意识形态风险应对[J].思想教育研究, 2024, 36(2) : 99-106.
ZENG J Q, LI J J.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response to ideological risks in the digital age[J].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2024,36(2):99-106.
- [15] 刘淼.数字鸿沟: 定义域的扩展与实践场景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3, 52(4): 135-142.
LIU M. Digital divide: expansion of domain of definition and analysis of practical scenario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3,52(4):135-142.
- [16]韩雷,田知敏慧.数字经济与技能工资差距: 基于 CFPS 的微观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24,46(2):75-89.
HAN L,TIAN Z.Digital economy and skills wage gap: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CFPS Data[J].Modern Economic Science,2024,46(02):75-89.
- [17]白雪洁,李琳,宋培.兼顾效率与公平: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1):38-50.
BAI X J, LI L, SONG P.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23(1):38-50.

[18] 张笑, 孙典.再谈“数字鸿沟”: 新兴技术关注度与社会公平感知[J].科学学研究, 2024, 42(10): 2028-2037.

ZHANG X, SUN D. Revisiting the “digital divide”: emerging technology concern and citizen’s perception of social fairness[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24,42(10):2028-2037.

[19] 托夫勒. 权利的转移[M].刘江, 陈方明, 张毅军, 等译.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20] SAMPLE I. Joseph Stiglitz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re going towards a more divided society”[N]. The Guardian, 2018-09-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8/sep/08/joseph-stiglitz-on-artificial-intelligence-were-going-towards-a-more-divided-society>.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2] 罗朝慧.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循环论证”和“孤立人”难题之伪: 从劳动和私有财产相互作用发展的感性历史来看[J].现代哲学, 2023, 39(5): 36-44.

LUO C H. The“circular reasoning”of early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the fallacy of the“isolated individuals” dilemma: from the perceptual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bour and private property[J]. Modern Philosophy, 2023,39(5):36-44.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7] 程宏燕, 郭夏青.人工智能所致的交往异化探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0, 36(9): 70-74.

CHENG H Y, GUO X Q.Research on the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2020,36(9):70-74.

[28] 方敏, 赵华熹.数字帝国主义: 新特点还是新阶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 35(2): 136-144.

.FANG M, ZHAO H X. Digital imperialism: a new feature or a new phase?[J]. Marxism & Reality, 2024,35(2):136-144.

[29] 邓伯军.人工智能的算法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批判[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 44(5): 24-32.

DENG B J. The algorithmic pow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deological criticism[J].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2023,44(5):24-32.

[30] 王锋.数字技术对权力的双重影响及其未来走向[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28(5): 23-33.

WANG F.Dual influ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power and its future trend[J].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24,28(5):23-33.

[31] 叶扬.科学社会主义简明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